

西方政治思想

古典政治思想

色诺芬著作《居鲁士的教育》的性质 与素材来源

吕厚量

摘要:在古典学研究史上,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向来是一部性质难以确定的独特作品。《居鲁士的教育》同色诺芬的另一部作品《拉栖第梦政制》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应被视为一部描述如何在理想王政下推行社会道德教育的叙事性作品。作品中的核心人物——对社会进行理性管理与德化教育的完美君主居鲁士大帝——的形象主要是在色诺芬生活时代的若干优秀历史人物言谈举止的基础上提炼整合而成的;居鲁士大帝式的英雄人物承载着将色诺芬本人为他身处的四分五裂、道德败坏的希腊世界量身定做的乌托邦式治理模式付诸实践的使命。

关键词:《居鲁士的教育》;色诺芬;社会道德教育

一、导 言

作为色诺芬篇幅最长的现存作品,《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一书的性质长期以来一直饱受争议。^①它涉及了色诺芬在

作者简介: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希腊史学中帝国形象的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5CSS006)阶段成果。

^① 参见 P. Carlier, “The Idea of Imperial Monarchy in Xenophon’s *Cyropaedia*,” in *Xenophon*, V. Gray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27; M. Reichel, “Xenophon’s *Cyropaedia* and the Hellenistic Novel,” in *Xenophon*, p. 420.

其他著作中探讨过的几乎一切主题——统治术、哲学、教育、军事技术、波斯风俗,等等。早在罗马共和晚期,读者们已感到这部作品过于庞杂,以至于需要对之进行若干开宗明义式的导读。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西塞罗认为,《居鲁士的教育》所提供的“不是信史,而是一件公正政体的理想模型”(non ad historiae fidem scriptus sed ad effigiem iusti imperi)^①。

昆图斯·西塞罗是否赞同其兄长的观点,我们如今已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多数现代研究者都不认为这种简单化的解释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居鲁士的教育》内容的丰富程度显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交代清楚的。米勒在《居鲁士的教育》序言中指出:“《居鲁士的教育》汇集并总结了色诺芬著述的几乎全部成果。”^②20世纪80年代,格拉仍在她研究《居鲁士的教育》的专著中坦承,自己对所分析的这部著作的性质与目的并不清楚。^③显然,诸如此类的说法并不是对色诺芬写作水平的褒扬,因为它们等于在宣称色诺芬的撰述主旨是含混不清、杂乱无章的。但就连高度赞扬过色诺芬文学成就的迪尤也不得不在评价《居鲁士的教育》时承认:“色诺芬并未向读者们阐述一套高度成熟、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是由五花八门的多种元素拼凑起来的,反映了他对雅典、斯巴达思想与价值观念诸多方面的共鸣与抵触。”^④

其他一些学者则不愿轻言放弃寻找色诺芬代表作统一主旨思想的努力。他们坚信,既然色诺芬肯为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耗费巨大心血,那么,他必然是有其明确目的的。卢奇奥尼认为,色诺芬写作这部作品的真实目的在于团结四分五裂的希腊人抗击波斯帝

① Cic. *QFr.* 1.1.23.

② Xenophon, *Cyropaedia*, Books I-IV, W. Miller ed. / tra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 x.

③ 参见 D. Gera, *Xenophon's Cyropaedia, Style, Genre, and Literary Technique*, Clarendon Press, 1993, p. 1.

④ B.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28-229.

国^①；卡利尔甚至相信，色诺芬是在为防止希腊征服波斯后走向腐化堕落而献计献策^②。然而，正如迪尤所指出的那样，设想色诺芬会为了征服波斯而选取波斯政体为理想模板的假说未免牵强。^③并且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对波斯的态度其实是同他真正具备泛希腊主义精神的作品《阿格西劳斯》(Agesilaus)中的大量言论背道而驰的。^④克里斯蒂森认为，《居鲁士的教育》是为当时斯巴达的军事改革量身定做的一本技术指导手册，其借用波斯帝国历史外壳的做法是为了增强作品本身的说服力。^⑤有趣的是，我们发现阿祖莱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后者认为，色诺芬选择波斯与居鲁士大帝为主题的做法正是由于他对当时的斯巴达政权灰心绝望。^⑥然而，上述几种假说事实上都缺乏坚实的证据支撑，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近年来，多数《居鲁士的教育》的研究者开始回归西塞罗的基本思路——《居鲁士的教育》是一部探讨政治与统治艺术的著作。法贝尔指出，《居鲁士的教育》所提出的政治学说主导了此后300年间的希腊化世界，其主题是探讨如何成为“成功的帝国君王”。^⑦尼维尔相信，《居鲁士的教育》所讨论的是政治生活可能存在的基本组织形式，在这层意义上，它是一部同柏拉图《法律篇》、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性质近似的政治学著作。^⑧格拉更加明确地指出，色诺芬

① 参见 J. Luccioni, *Les idée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de Xénophon*,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47, pp. 203, 232, 305。

② 参见 Carlier, “The Idea of Imperial Monarchy in Xenophon’s *Cyropaedia*,” p. 366。

③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23。

④ 参见 É. Delebecque, *Essai sur la vie de Xénophon*, Klincksieck, 1957, p. 467。

⑤ 参见 P. Christensen, “Xenophon’s ‘*Cyropaedia*’ and Military Reform in Sparta,”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126, 2006, pp. 47, 63。

⑥ 参见 V. Azoulay, “The Medo-Persian Ceremonial: Xenophon, Cyrus and the King’s Body,” in *Xenophon and His World,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Held in Liverpool in July 1999*, C. Tuplin ed., Stuttgart, 2004, p. 153。

⑦ 参见 J. Farber, “The *Cyropaedia* and Hellenistic Kingship,”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00, No. 4, 1979, pp. 497, 504。

⑧ 参见 W. Newell, “Tyranny and the Science of Ruling in Xenophon’s ‘*Education of Cyru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5, No. 4, 1983, p. 889。

是按照古希腊的政体(πολιτεία)研究传统来撰写这部著作的。^①

笔者认为,根据《居鲁士的教育》的文本内容来看,认为这部作品符合政体研究传统的解释模式是相对合理的。然而,这一假说必将导致文化传统所赋予这部著作的标题同作品实际主题之间的尖锐矛盾。如果这部色诺芬著作确实是以政体为研究主题的话,那么,色诺芬本人(或该书的早期编订、抄录者们)为何要将之命名为“居鲁士的教育”(Κύρου παιδεία),而非符合色诺芬另一部政体著作《拉栖第梦政制》与“老寡头”(Old Oligarch)、亚里士多德的两部《雅典政制》命名习惯的《波斯政制》呢?

更大的麻烦在于,出于色诺芬本人之手的《拉栖第梦政制》(也是希腊文化史上关于该主题最早的现存样本^②)虽然可以归入政体文学传统之中,却并非一部探讨政治组织方式的典型作品。古典时代政体研究传统的分析者伯德斯认为,一方面,色诺芬的《拉栖第梦政制》确实与同时代的古代政治学作品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它也呈现出许多有别于老寡头《雅典政制》等作品的独特之处。^③换言之,《拉栖第梦政制》实为古希腊政体文学传统内的一部非常规作品。利普卡认为,该作品的传统手稿标题“拉栖第梦政制”(Λακεδαιμονίων Πολιτεία)多少是有些牵强附会的,因为色诺芬所讨论的实际上是相当宽泛意义上的“公共事务”。^④事实上,色诺芬这部作品主要探讨的乃是斯巴达的教育制度。税收制度、议事会的组织模式和司法审判流程等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论著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主题并非色诺芬重点关注的对象。

作为同时出现在色诺芬现存著作集中的两部较难把握性质的作品,《居鲁士的教育》大谈政治统治艺术,《拉栖第梦政制》反倒

① 参见 Gera, *Xenophon's Cyropaedia, Style, Genre, and Literary Technique*, p. 11.

② 参见 S. Rebenich ed./trans., *Xenophon: Die Verfassung der spartaner*,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8, p. 14.

③ 参见 J. Bordes, *Politeia dans la pensée grecque jusqu'à Aristote*, Les Belles Lettres, 1982, pp. 202-203, 166.

④ M. Lipka ed./trans., *Xenophon: Spartan Constitution*,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mmentary, Walter de Gruyter, 2002, p. 97.

将儿童与青年的教育作为核心主题——这种作品传统题目与内容之间的严重错位显然是需要现代研究者们予以澄清的。笔者认为，消除这一逻辑矛盾的关键在于把握色诺芬从“社会教化”的角度出发对“教育”（*παιδεία*）形成的独特理解。在古典学研究史上，克里斯托弗·塔普林已对色诺芬作品中波斯与斯巴达的文学形象进行过对比研究（当然不仅限于《居鲁士的教育》与《拉栖第梦政制》内容与主题的比较）；但他的结论否认二者间存在着基本相似性。在他看来，以同时代的斯巴达为模板去描述古代波斯帝国绝非色诺芬的本意；并且两种政体之间的若干差异是一望即知的。^①然而，笔者认为，尽管正如塔普林所指出的那样，《居鲁士的教育》中的波斯帝国并非以现实生活中的斯巴达为模型；但两个政权（以及《居鲁士的教育》和《拉栖第梦政制》两部著作的主题）之间的相似性其实是不容否认的，反映了色诺芬一以贯之的、对政治与社会化教育互为表里关系的个人理解。为了认清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对《居鲁士的教育》和《拉栖第梦政制》的具体内容进行比较分析。

二、《居鲁士的教育》与《拉栖第梦政制》的主题异同

从色诺芬本人（或其文本的早期编订者）提供的作品标题来看，《居鲁士的教育》的主题应当是与居鲁士大帝有关的教育内容；《拉栖第梦政制》所探讨的则是斯巴达政权的政治组织与结构。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从篇幅上看，短小精悍的《拉栖第梦政制》自然是无法与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居鲁士的教育》等量齐观。然而，对两部作品内容的细致比对表明，尽管差异确实存在，两部著作主题的共通之处却是相当可观的。

（一）虔敬神明与尊重权威

虔敬神明与效忠君王是《居鲁士的教育》所宣扬的两项至高美德，并且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根据色诺芬的报道，居

^① 参见C. Tuplin, "Xenophon, Sparta and the *Cyropaedia*," in *The Shadow of Sparta*, A. Powell and S. Hodkinson eds., Routledge for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1994, pp. 162, 138-139.

鲁士在攻占巴比伦后“相信朋友们的虔诚(εὐσέβεια)是于己有利的……居鲁士认为如果他的所有朋友们都敬畏神明的话,他们便不大可能会对彼此和他本人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因为他自视为朋友们的造福者”^①。我们看到,作者所论述的动机兼具教育与政治的双重特性:一方面,虔诚的道德意义当然是色诺芬所提倡的社会教育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它也具备自身的政治价值——敬畏神明的臣民通常是不会对居鲁士及其统治构成威胁的。出于这一动机,居鲁士大帝抓住各种机会向自己的追随者们灌输虔诚的观念。例如,居鲁士在战争中使用的暗号口令往往是“神明是我们的佑助者(拯救者)与指引者”^②。而当将士们赢得战斗胜利后,居鲁士要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神明献祭。^③居鲁士的这道指令将对胜利的犒赏、神明的佑助、严格的军纪和对自身指挥权的敬畏合而为一,并将至高的荣誉赋予神明而非自己。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将道德教化与统治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巧妙方式。

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居鲁士大帝还通过自身近乎神奇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追随者们的尊敬。在整部著作中反复出现的情节是:每当居鲁士大帝提出倡议并向属下们征求意见时,后者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的提议。^④如果他们当真开口说话的话,我们听到的也只是对居鲁士的赞美言辞。他的一名族人说道:“国王啊,在我看来,您是一位天生的帝王,就像蜂巢中的蜂群首领一样。正如与生俱来的神奇本能促使蜂群自愿地追随蜂后左右、无条件地服从其指令一样,在我看来,世人也出于某种类似的本能而心甘情愿地受您驱驰。”^⑤居鲁士的另一名追随者提格拉尼斯(Tigranes)则对居鲁士说道:“您永远无须对我的缄默感到惊讶。因为我的习惯并不是向您进言献策,而是执行您的一切指令。”^⑥可见,这些臣子对居

① Xen. Cyr. 8. 1. 25.

② Xen. Cyr. 3. 3. 58; 7. 1. 10.

③ 参见 Xen. Cyr. 4. 1. 6。

④ 参见 Xen. Cyr. 4. 4. 8。

⑤ Xen. Cyr. 5. 1. 24—25.

⑥ Xen. Cyr. 5. 1. 27.

鲁士的服从是无条件的；但这种服从并非受迫于居鲁士的权威或高压，而是居鲁士大帝人格魅力感召的自然产物。

这种局面真的可能在历史情境下发生吗？大部分现代读者无疑会认为，此类场景只有在色诺芬过度简化，甚至虚构杜撰的情节叙述中才有可能出现；但色诺芬却在作品中明确指出，这种统治效果至少在理论上是有可能实现的。冈比西斯对居鲁士的告诫清晰地反映了作者的这一思路。

还有一条好得多的捷径，那就是自愿的服从。民众只会自愿服从比自己更加明智的人的领导。你可以通过许多事例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病人如何自愿地服从医嘱，海上的水手们如何自愿地听从舵手，以及旅客如何不愿离开比自己更熟悉旅途的同行者。^①

根据同样的推理方式，精明强干、造福民众的政治领袖是完全有能力“教育”下属自愿地服从自己的。事实上，在色诺芬的叙述体系中，居鲁士大帝主要是通过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的手段完成了波斯帝国的统一大业，这也正是他有别于其他征服者的伟大之处。在色诺芬笔下，居鲁士大帝的人格魅力具备着某种神奇效果，以至于“民众自愿服从居鲁士，尽管一些人距他有几天的路程，有些人距他足足有数月的路程，有些人同他素未谋面，另外一些人明知自己终生都将无缘站在国王面前，但他们全都对国王的指令心悦诚服”^②。居鲁士大帝正是凭借着臣民的信任与顺从维持着波斯帝国全境的统一与安宁。^③色诺芬用近似颂歌式的笔触赞美道：“他（居鲁士大帝）统治着所有这些族裔，尽管它们彼此之间或同他本人并不讲同样的语言；他能够令如此广大区域内的臣民对自己心存敬畏，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胆敢尝试同他作对；他又能激发全体臣民对自己的爱戴之情，使得他们全都心甘情愿地服从自己的意志。”^④我们从中再次看到了教育与政治目的的统一性：居鲁士采取的手段

① Xen. Cyr. 1.6.21.

② Xen. Cyr. 1.1.3.

③ 参见 Xen. Cyr. 1.1.4.

④ Xen. Cyr. 1.1.5.

是道德化的与教育性的；而他的动机与行动后果显然是政治性的。

与《居鲁士的教育》详细探讨理想君主同臣民关系的思路不同，《拉栖第梦政制》关注的乃是斯巴达法律对民众的影响。相形之下，后者的结构显然更加单纯，内容也更为简明。然而，色诺芬笔下斯巴达人遵纪守法的特征几乎构成了《居鲁士的教育》中相应文本的翻版与摘要。在《拉栖第梦政制》中，“儿童督导”（ὁ παιδονόμος）^①与法律取代了居鲁士大帝的角色。国王莱库古则取代了神明的地位，通过立法手段向民众灌输自己的意志。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位斯巴达国王在葬礼上是作为“英雄”（ὁ ἥρωας）而非“凡人”（ὁ ἄνθρωπος）受到纪念的。^②色诺芬告诉我们，当斯巴达少年们发生斗殴时，“任何碰巧在场的人都有权将打斗双方分开。如果任何一方拒绝服从调解者的话，儿童督导便会把他带到监察官（ἐφορος）面前。监察官将对这样的少年进行极其严厉的惩罚，以便确保仇恨情感永远不可凌驾于遵纪守法的原则之上”^③。尽管少年斗殴的严重性无法同帝国分裂相提并论，但《拉栖第梦政制》关于尊重权威的严格规定却是同《居鲁士的教育》如出一辙的。

（二）自律精神

在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的叙述体系中，尽管国王的人格魅力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强大且有效的，自律的美德对于有可能脱离君主与旁人监督的臣民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色诺芬强调指出，居鲁士大帝亲自作出了自律（σωφροσύνη）的表率，从而促使全体臣民去努力追求这一美德。^④根据色诺芬的观点，自律是可以通过道德教育培养起来的优秀品质；通过以身作则的垂范作用教育民众学会自律乃是居鲁士大帝等贤明君王应尽的义务：“当弱者们（οἱ ἀσθενέστεροι）看到可以为所欲为者仍旧厉行自律时，他们势必会留意不让自己做出出格的举动。”^⑤色诺芬相信，这种言传身教

① Xen. Lac. 2. 2.

② Xen. Lac. 15. 9.

③ Xen. Lac. 4. 6.

④ 参见 Xen. Cyr. 8. 1. 30.

⑤ Xen. Cyr. 8. 1. 30.

型的教育方式确实能够对臣民的道德品质产生积极影响。居鲁士大帝只须提醒廷臣们注意不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和擤鼻涕^①，高雅得体的波斯宫廷礼仪便被成功地树立起来，一直维持到色诺芬本人所生活的时代^②。色诺芬的描述意在说明，自律精神，包括交往礼仪中的种种细节规范完全是可以通过杰出领袖为追随者们树立的榜样而成为良好的时代风气的。

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这种垂范式的道德教育同样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当波斯人牢牢掌握了控制广袤帝国的政治权力后，居鲁士立刻提醒他们要在当家作主后注意培养自律精神。他向自己的同胞告诫道：“请你们牢记，我们必须在掌握这些优势后比从前更加重视美德；因为一个人所得愈多，就会有更多的人嫉妒、反对他，转而成为他的仇敌，在此人剥削、奴役不情愿的被统治者时尤其如此。”^③他还在另一场合下向族人们义正辞严地指出：

我们有什么借口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呢？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权力吗？但统治者的品质不可比被统治者更为恶劣。那么是因为我们看似较从前更加幸运吗？莫非有人会说邪恶宜于同好运相配？难道是因为既然我们拥有奴隶，我们就有权在他们表现不好时予以责罚？自身生性邪恶的人有什么理由去惩罚别人的过失呢？^④

笔者认为，这些段落清晰反映了自律精神的道德特征同政治之间的关系。自律精神使得统治者在独处之际或在被统治者面前继续维持着自己的美德形象；正是这种受人尊敬的声望维持着波斯人的领导地位与权威，并保护他们免遭臣民的忌恨。这一思路反映了色诺芬的典型逻辑思维方式，揭示了他对道德教育与统治术关系的基本态度。

无独有偶，《拉栖第梦政制》中讨论儿童教育的一段文字同样涉及了自律这一主题。

① 参见 Xen. Cyr. 8.1.42。

② 参见 Xen. Cyr. 1.2.16。

③ Xen. Cyr. 7.5.77。

④ Xen. Cyr. 7.5.83。

当他们结束童年时代,步入少年阶段时,其他希腊人会允许他们摆脱教仆(παιδαγωγός),告别老师(διδασκαλός);这样他们就不再受任何管教,可以自行其是。莱库古在这方面同样设计了与众不同的制度。他认识到,处于这一年龄段的人往往心浮气躁,被粗暴的性情左右,其追求各种物质享乐的欲望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莱库古尽量多地向他们分派劳役,并千方百计地占用他们的闲暇时间。此外,他还规定,但凡逃避这些义务的人都不得享受各种利益。他命令公务人员和亲戚们都要管束这些少年,使得他们不致因怯懦而在城邦里彻底辱没名声。莱库古还希望少年们能够常怀敬畏之心,于是规定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必须将手放在长袍下面,默默地走路,不得四处张望,而要眼盯着脚前方。这样他就向世人清楚地表明,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强的自制力(σωφροσνεῖν)。换言之,他们比石像更为安静,一直少言寡语;比铜像还要坚定,永远目不转睛。他们看上去比自己眼里的瞳仁还要羞怯。当这些少年去吃公共便餐(φιλίτιον)时,除非有人向他们发问,否则你就休想听到这些人的声音。^①

不难看出,两部著作中的相关文本在内容与用词等方面存在着耐人寻味的相似性。在《居鲁士的教育》中,自律精神在波斯人成为帝国统治者后变得至关重要。而在《拉栖第梦政制》里,自律同样成了少年们脱离督导监管、成为自己身体主宰后的首要要求。《居鲁士的教育》中的道德教育服务于政治目的;《拉栖第梦政制》中的政治制度则为教育活动的效果提供了基本保障。

(三) 军事化管理与体育锻炼

在社会管控中应用军事化管理手段是《居鲁士的教育》的重要特色之一。色诺芬借居鲁士麾下将领克吕珊塔斯(Chrysantas)之口宣称,军事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存在着内在的相通性:“不服管教的士兵如何能够攻城略地或守卫城池?桀骜不驯的队伍如何能够赢得胜利?只顾个人安危的散兵游勇怎能避免一触即溃?”

^① Xen. Lac. 3. 1-5.

不听指挥的军人能够获取什么成就？没有规矩约束的话，国家怎能得到合法治理？私人产业怎能得到妥善经营？船只怎能平安抵达目的地？”^①这一连串的追问意在表明：军事纪律与管理手段在其他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同样是不无裨益，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将克吕珊塔斯的想法付诸实践的同样是居鲁士大帝。首先，居鲁士借用了军事化手段去进行行政管理。在第八卷中，色诺芬为我们描述了居鲁士的军事化行政管理艺术。

他（居鲁士）思索着如何能够在拱手而治的前提下出色地完成行政管理的职责。他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军事组织方式：每位十夫长负责管理 10 人，每位百夫长负责管理 10 名十夫长，每名千夫长负责管理 10 名百夫长，每名万夫长则负责管理 10 名千夫长。这样一来，尽管士兵数以万计，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管理；当将领需要调动军队时，他只需要将命令传达给各位万夫长即可。于是，居鲁士大帝按照同样的方式集中了手头的行政权力。这样一来，他只需跟几名官员进行交流，就足以将自己的行政命令充分贯彻下去。通过这种方式，他也获得了比一座住宅或一艘舰船的管理者更多的闲暇。^②

其次，居鲁士还将作为一种军事训练活动的狩猎确立为下属和他本人必须定期接受的体育操练手段^③，其理由是任何出色的政治领袖都必须精通战争艺术^④。这一观念同色诺芬《论狩猎》（*Cynegeticus*）中的主张是一致的。色诺芬在《论狩猎》中写道：“我建议青年们不要轻视狩猎或其他教育形式。因为人们可以凭借这些技巧而变得精于战事，并在其他一切需要卓越思想、言行的事务中出人头地。”^⑤

我们在《拉栖第梦政制》所描述的城邦生活中看到，斯巴达的青少年们同样是在极其严格的军事纪律与体育锻炼要求约束下接

① Xen. Cyr. 8.1.2.

② Xen. Cyr. 8.1.14—15.

③ 参见 Xen. Cyr. 8.1.34。

④ 参见 Xen. Cyr. 8.1.37。

⑤ Xen. Cyr. 1.18.

受种种训练的。儿童督导有权体罚男孩儿们,并要求他们终年统一着装。青年们甚至还要练习忍饥挨饿。^①与居鲁士大帝的理念相同,莱库古同样将狩猎视为一种宝贵技能,并“将狩猎树立为青年完成公共义务之余的一种常规高雅消遣活动”^②。甚至出身自由人家家庭的女孩们也必须参与体育锻炼,以便将来能够生育健壮的儿女。^③所有这些手段都同《居鲁士的教育》中的统治政策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四)对教育活动与公共道德的密切监督

色诺芬社会教育思想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基础教育与公共道德的负责人自身必须具备高贵的美德。在古典时期雅典的典型家庭生活中,抚养、教育儿童的职责通常是由奴仆、女性和老人来承担的。^④因此,除色诺芬与亚里士多德外,雅典作家们往往并不关心基础知识与行为规范的传授者。然而,在《居鲁士的教育》和《拉栖第梦政制》中,色诺芬均对这一角色予以高度重视。在前者中,色诺芬拓展了传统意义上“教育”(παιδεία)的年龄适用范围,使之延伸为对终身道德教育的系统监督机制;而在后者中,色诺芬的注意力主要则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范畴,即对儿童和青年的抚养与教导。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色诺芬笔下理想化的波斯与斯巴达社会中发现极其相似的道德监督机制。

色诺芬借居鲁士之口指出,只有品行高洁之人才能承担道德教育的重任。因为“卑下的情操往往比高贵的精神更能迎合人的本性。由于作恶足以逞一时之快,恶行可以借助种种诱惑而吸引大批追随者;行善则犹如负重上山,乍看上去并不讨人喜欢或令人毫无顾虑。而一旦有人教唆受教育者误入歧途,土崩瓦解之势便在所难免”^⑤。因此,邪恶伴侣(无论他是教育者还是亲密朋友)的负面影

① 参见 Xen. Lac. 2.1—5。

② Xen. Lac. 4.7。

③ 参见 Xen. Lac. 1.4。

④ 参见 J. Christes, “Paidagogos,” in *Der neue Pauly, Enzyklopädie der Antike* 9, H. Cancik and H. Schneider eds., J. B. Metzler, 2000, col. 150。

⑤ Xen. Cyr. 2.2.24。

响是灾难性的，向善者必须“不惜代价地清除他们”^①。因此，居鲁士在为臣民们挑选教育者时费尽了心思。在他看来，真正适合承担道德教育职责的只有父母和政治领袖本人。居鲁士对波斯人讲道：“要亲自教育我们生育的儿子们，因为我们自己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只要我们尽力为他们树立最好的榜样，孩子们即便动了念头，也不会轻易走上邪路；因为他们不会看到或听闻可耻的事情，而会在追求“美好与高贵”（καλὸς κάγαθός）的目标过程中健康成长。”^②与此同时，这些父亲们的终极道德教育者则是居鲁士大帝本人。克吕珊塔斯对此评论道：“各位，我已多次认识到，一位优秀的统治者无异于一名好父亲。正如父亲关爱自己的子女，使他们不至于缺吃少穿一样；在我看来，居鲁士也不断向我们提出忠告，以便我们能够维持目前的兴盛局面。”^③换言之，对全社会进行道德教育的重担最终落在了理想化的政治领袖——《居鲁士的教育》中的居鲁士大帝——肩上。这一看似过于苛刻的要求也许并不现实，但它在色诺芬的道德教育体系中构成了至关重要的环节。

为了对臣民们进行严格监督，居鲁士大帝甚至雇用了众多“耳目”（ὀφθαλμοὶ καὶ ὄτα βασιλεώς）。他们负责对波斯帝国臣民的行为举止与道德风尚进行秘密监督，并随时向居鲁士本人进行报告。居鲁士还鼓励臣民们彼此之间进行道德督促，以便他们感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处于旁人的关注之下，从而在追求美德的道路上努力前行。^④

与此类似，在《拉栖第梦政制》所描述的政治体系下，斯巴达儿童督导也必须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⑤即便在他碰巧外出的情况下，斯巴达儿童们仍不缺乏道德监督者，因为碰巧在场的任何公民都有义务担任他们的临时督导。^⑥这套监管体系是全面、严格，

① Xen. Cyr. 2.2.25.

② Xen. Cyr. 7.5.86.

③ Xen. Cyr. 8.1.1.

④ 参见 Xen. Cyr. 8.2.10—12。

⑤ 参见 Xen. Lac. 2.10。

⑥ 参见 Xen. Lac. 2.10—11。

甚至苛刻的；它与通行的希腊伦理观念颇多龃龉，但在色诺芬的道德教育—政治治理理论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五）对公共生活的高度重视

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居鲁士鼓励自己的臣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居鲁士专门为自己搭建了一座巨大的帐篷(σκηνή)，用来容纳他在一日之内宴请的众多宾客。^①在居鲁士看来，公共宴饮同样具备某种教育功能，因为“赴宴者必然不愿做出任何有失身份或不道德的举动，因为他们不仅坐在君王面前，而且还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宴会上最优秀的人物们看在眼里”^②。如果有人拒绝赴宴的话，居鲁士便有理由怀疑他们“犯下了某种出格的、不义的或玩忽职守的罪过”^③。并且他还会千方百计强迫这些失约者参加下一次公共宴会。^④

有趣的是，我们在《拉栖第梦政制》中也发现了一座功能相似的营帐，也就是莱库古举办公共宴会所使用的帐篷，它的功能是保证国王能与公民们一起用餐并参与公共生活。^⑤国王举办宴会的动机也同居鲁士大帝十分相似：拒绝参与公共活动、深居简出的公民会被怀疑有不检点行为^⑥；而在公共场合下注意举止得体适度的紧张感也有助于提升公民们的道德水准^⑦。甚至连老人们也不会彻底告别公共生活，因为莱库古会专门从高龄公民中选举元老院(γεροντία)成员，以便他们在年迈之际仍能牢记治国的基本原则。^⑧在重视公共生活方面，《居鲁士的教育》与《拉栖第梦政制》再度呈现出了高度相似性。

① 参见 Xen. Cyr. 2. 1. 30。

② Xen. Cyr. 8. 1. 16。

③ Xen. Cyr. 8. 1. 16。

④ 参见 Xen. Cyr. 8. 1. 17—20。

⑤ 参见 Xen. Lac. 15. 4。

⑥ 参见 Xen. Lac. 5. 2—3。

⑦ 参见 Xen. Lac. 5. 6—7。

⑧ 参见 Xen. Lac. 10. 1。

(六) 两个伟大政权的共同命运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加以比较的两部作品各自附有一篇简短后记（《居鲁士的教育》第8卷第8章和《拉栖第梦政制》第14节）；两篇后记分别概述了波斯与斯巴达在各自的杰出领袖逝世后走向道德衰落的命运。在色诺芬文本研究史上，大量学者曾围绕这两段文字的真伪性展开过热烈讨论。^①在出版于1914年的“勒布古典丛书”版《居鲁士的教育》中，校译者米勒相信第8卷第8章必然是后世窜入的文字。他的理由是这一章“破坏了全书的完美统一性”。但由于这段“窜入文字”出现在了几乎所有现存手稿与前人校订本中的缘故，他决定将这部分文本与译文保留下来，但建议读者们“在此掩卷，结束阅读”。^②然而，在今天看来，米勒的观点未免过于主观，因为当代学者们很难接受他的这种过度简单化的结论。

个别研究者仍然相信文本窜入的问题确实存在。塔图姆认为，这段附录突兀地指出，居鲁士大帝苦心经营的整套制度在他去世后马上变得难以为继，它所反映的只能是某些仇视波斯的希腊作家，而非色诺芬本人的立场。^③但大部分学者相信，《居鲁士的教育》第8卷第8章同前文在文字风格和逻辑上的统一性是不容置疑的。萨格指出，第8卷第8章第2节在行文上起到了将第8章第8节与第8章第7节紧密衔接起来的结构功能。^④格拉相信，色诺芬在前文中早已暗示，波斯帝国的悲剧性结局早在居鲁士统治末年业已注定，因为居鲁士大帝本人已在攻克巴比伦后由一位理想政治领袖蜕变为专制暴君，并且第8章第8节同前文的语言风格也

①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p. 16–20; Bordes, *Politeia dans la pensée grecque jusqu'à Aristote*, p. 165.

② W. Miller ed./trans., *Xenophon: Cyropaedia, Books V–VIII*,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p. 438–439.

③ 参见 J. Tatum, *Xenophon's Imperial Fic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22.

④ 参见 P. Sage, “Dying in Style: Xenophon's Ideal Leader and the End of the ‘Cyropaedia’,”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90, No. 2, 1995, pp. 167–168.

是高度一致的。^①迪尤认为,第8章第8节集中讨论的话题其实早已在前文中有所涉及。^②要之,当代相关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居鲁士的教育》第8卷第8章确实出自色诺芬本人之手。^③

《拉栖第梦政制》第14节在文本批判史上的命运几乎与此如出一辙;利普卡已对相关学术史进行过全面详尽的梳理。^④概言之,少数前代学者对《居鲁士的教育》第8卷第8章和《拉栖第梦政制》第14节真实性提出的质疑并无任何文本与手稿方面的可靠证据;这种怀疑是主观性的,或许反映了对色诺芬思想与古典作家写作习惯的某种误解。笔者认为,仅仅以叙述语气的转变为理由去质疑两段文本真实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首先,认为理想的社会道德与政治制度终将走向衰落的思想在古希腊作家中其实相当普遍。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天神宙斯所创造的人类在5个时代中不断走向道德沦丧的演变趋势。^⑤无独有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也承认即便最优秀的政体——“斯巴达模式”——也会逐步走向衰落。^⑥因此,古希腊读者们不会对色诺芬关于波斯道德风尚与斯巴达政体在各自的英雄领袖去世后走向衰落的记载感到惊奇。其次,波斯与斯巴达古今社会状况的反差乃是古典时代阿提卡作家们头脑中的基本常识。在《波斯人》中,埃斯库罗斯对居鲁士大帝等伟大波斯先王的英武与薛西斯的庸碌无能进行了鲜明对比。^⑦伊索克拉底一方面在写给腓力(Philip II)的信函中赞美了居鲁士大帝的功业与声名^⑧,一方面又在《泛希腊赛会演说词》

① 参见 Gera, *Xenophon's Cyropaedia, Style, Genre, and Literary Technique*, pp. 286, 296-297, 300。

②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20。

③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16。

④ 参见 Lipka ed./trans., *Xenophon: Spartan Constitution*,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mmentary, pp. 27-31。

⑤ 参见 Hes. *Op.* 109-201。

⑥ 参见 Pl. *Resp.* 551a-579e。

⑦ 参见 Aesch. *Pers.* 765-783。

⑧ 参见 Isoc. *Phil.* 66-67。

中贬损了居鲁士的后继者^①。这些评论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并且古希腊的听众或读者们也并不会产生这方面的疑问。^②毋庸讳言的是，斯巴达的政治霸权也确实在受挫于底比斯后走向了瓦解；像色诺芬这样的道德论者将斯巴达衰落的根源归结为道德沦丧当然是不足为怪的。要之，笔者认为，上述两份文本作为色诺芬本人思想载体的性质是无可怀疑的；对二者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居鲁士的教育》同《拉栖第梦政制》之间的相似性。

根据色诺芬的记载，当居鲁士大帝与世长辞之后，“他的儿子们马上陷入了纷争；各地的城市与族裔开始与国王离心离德，一切都在变得每况愈下”^③。最大的变化在于，波斯人不再像从前那样虔诚恭顺，其根源则是后世国王与官吏们丧失了先辈的荣誉感。在晚近的社会环境下，波斯臣民们不再信任行省总督，因为他们的不守信用已经臭名昭著。^④信任感丧失的直接后果便是居鲁士大帝树立的道德规范迅速解体，“亚洲的全体居民逐渐走向邪恶与堕落”^⑤。色诺芬对此评价道：“统治者的品质如何，他们治下的大部分民众就会变得与之大同小异。”^⑥居鲁士大帝时代的种种美德随之走向衰落。波斯人在金钱交易中变得言而无信^⑦；他们酗酒成风^⑧、骄奢淫逸^⑨、心术不正^⑩，废弃了军事操练传统，将守卫波斯帝国的任务交给希腊雇佣兵去完成^⑪。通过这些描述，色诺芬向我们指出，英

① 参见 Isoc. *Paneg.* 144—153。

② 参见 N. Sandridge, *Loving Humanity, Learning, and Being Honored: The Foundations of Leadership in Xenophon's Education of Cyrus*,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2012, p. 10。

③ Xen. *Cyr.* 8.8.2。

④ 参见 Xen. *Cyr.* 8.8.3。

⑤ Xen. *Cyr.* 8.8.5。

⑥ Xen. *Cyr.* 8.8.5。

⑦ 参见 Xen. *Cyr.* 8.8.6。

⑧ 参见 Xen. *Cyr.* 8.8.8—9。

⑨ 参见 Xen. *Cyr.* 8.8.12, 8.8.15。

⑩ 参见 Xen. *Cyr.* 8.8.13—14。

⑪ 参见 Xen. *Cyr.* 8.8.26。

雄人物的死亡或离去会导致此类道德教化事业的急转直下,这种衰落恰恰可以反衬出以居鲁士大帝为代表的理想政治领袖对于全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意义与核心作用。

那么,莱库古逝世后斯巴达的社会状况又如何呢?色诺芬写道:“如果有人问我是否相信莱库古时代的规矩原封不动地保留到了今天的话,凭宙斯起誓,我是不敢自信地给出肯定答复的。”^①在色诺芬眼中,斯巴达的道德风尚同样走向了腐化堕落。贵族们如今喜欢定居在城邦之外,不愿固守乡土;公民们为攫取权力而勾心斗角,并不在意自己是否具备担任领袖的品质;其他希腊人不再衷心欢迎斯巴达人担任希腊世界的领袖,而是千方百计地试图阻止腐化堕落的斯巴达人重建霸权。^②尽管色诺芬对同时代斯巴达社会的批判在言辞上不如对波斯那么激烈,但他对二者的历史演变趋势的描述却是如出一辙的。

(七)两种政体的相通本质:理想政治领袖依据贤明法度进行的道德教化

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居鲁士的教育》经常被描述成一部探讨不受法律约束的绝对王权统治形式的著作。尼维尔指出:“色诺芬政治思想的核心是试图将僭主制度改良为一种另类的治理模式——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对‘顺民’进行的统治。”^③尼维尔的观点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赞同。约翰逊相信,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对帝国是有着自己的批评意见的,因为这种体制是一种人治模式,并不符合法治原则。^④惠登更加大胆地认为,色诺芬“对帝国是持怀疑与批判态度的”^⑤。在他看来,《居鲁士的教育》事实上提出了由王权主导的两种统治模式,即个人专制与立法模

① Xen. *Lac.* 14. 1.

② 参见 Xen. *Lac.* 14. 4—6。

③ Newell, “Tyranny and the Science of Ruling in Xenophon’s ‘*Education of Cyrus*’,” pp. 890—891.

④ 参见 D. Johnson, “Persians as Centaurs in Xenophon’s ‘*Cyropaed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135, No. 1, 2005, p. 203.

⑤ C. Whidden, “The Account of Persia and Cyrus’ Persian Education in Xenophon’s ‘*Cyropaedia*’,”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69, No. 4, 2007, p. 540.

式,但二者都未在实践中获得成功。色诺芬的真正意图在于对比居鲁士与苏格拉底的教育方式,并告诫读者们采纳苏格拉底在《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中提出的告诫,因为哲学才是推行道德教育的唯一恰当方式。^①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将居鲁士时代的强盛与波斯帝国日后的衰落进行对比并非色诺芬本人的专利;这种做法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作家中是司空见惯的,并不能说明色诺芬对居鲁士的统治模式本身是持批评意见的。事实上,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全书开篇处对居鲁士大帝的热情赞美^②是同惠登的理论完全无法兼容的。

笔者认为,这些假说误解了居鲁士所推行的道德教化的实质。它确实是君主灌输给臣民的,但这一点也是居鲁士的统治与绝对专制形式的唯一共同点。在色诺芬所描述的道德教育模式中,三种元素是不可或缺的:道德教育的推行者必须是一位理想的政治领袖;民众必须乐于接受他的领导;并且这种教育必须在贤明法度的规范下才能顺利开展。

居鲁士与父亲冈比西斯的长篇对话集中反映了色诺芬对理想政治领袖的严格要求。他必须拥有货真价实的聪明才智^③;他必须通过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④;他必须拥有超越自己所有下属的顽强毅力^⑤;他还必须通过阅读历史、向哲人请教和研究其他政权的统治艺术来积累治国经验^⑥。为了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领袖,居鲁士努力在各个细节方面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例如,在军事生涯中,居鲁士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去牢记每一名部下的姓名和性格特征,以至于全体将领们都对居鲁士惊人的记忆力感到诧异,发现他能够脱口说出每位将士的姓名,并向他们布置符合各自特

① 参见 Whidden, "The Account of Persia and Cyrus' Persian Education in Xenophon's 'Cyropaedia'," pp. 561—562, 549—550, 567。

② 参见 Xen. Cyr. 1.1.1—3。

③ 参见 Xen. Cyr. 1.6.22。

④ 参见 Xen. Cyr. 1.6.23。

⑤ 参见 Xen. Cyr. 1.6.25。

⑥ 参见 Xen. Cyr. 1.6.44—46。

长的任务。通过这一看似繁琐的细节工作,居鲁士成功地提升了部将们对自己的忠诚感。^①正如格拉所言,居鲁士大帝的身影“在《居鲁士的教育》全书中是无处不在的”,他的建议永远会被恭顺的下属与臣民无条件地采纳。^②事实上,在色诺芬设计的政治模型中,也只有居鲁士大帝才是完成社会教化任务过程中唯一不可或缺的角色。《居鲁士的教育》全书提及了数百个人物,但其中只有十余人在色诺芬的叙述体系中扮演过活跃角色。^③其他人似乎仅仅是居鲁士个人意志的影子与回声。而在这些屈指可数的活跃人物中,在整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只有居鲁士的叔父库亚克萨瑞斯(Cyaxares)。但这一角色恰恰完全出自色诺芬的艺术虚构,并非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④事实上,这一虚构形象也并非不可或缺:他同样代表着居鲁士的个人意志,辅佐居鲁士完成其社会教化使命,但并不是这项事业终极意义上的承担者。

然而,理想政治领袖的素质并非仅仅是通过后天的勤奋学习和探索实践习得的;领袖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天才与圣人禀赋。根据色诺芬的记载,当一批亚美尼亚人觐见居鲁士后返回家乡时,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居鲁士的智慧、体魄、风度、俊美与威严。^⑤居鲁士大帝的个人魅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至今日,异邦人们仍在故事和歌曲中赞美居鲁士大帝的英俊相貌、古道热肠、勤勉好学和雄心壮志;他可以为了荣誉而忍受劳苦、出生入死。”^⑥他甚至具备某种解读神意的超自然能力,可以提前预知自己的死亡时刻。^⑦只有这样的理想君王与凡间“超人”才能将自己与生俱来并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磨砺的公正、慷慨、自律、坚忍与虔诚等高贵品

① 参见 Xen. Cyr. 5.3.46—51。

② 参见 Gera, *Xenophon's Cyropaedia, Style, Genre, and Literary Technique*, pp. 280, 282。

③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53。

④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55。

⑤ 参见 Xen. Cyr. 3.1.41。

⑥ Xen. Cyr. 1.2.1。

⑦ 参见 Xen. Cyr. 8.7.2。

质培植在廷臣、将士与普通民众的心里。^①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牢记,居鲁士大帝并不是一位为所欲为、权力无边的专制僭主,至少色诺芬无意将他描绘成一位无视法律的绝对专制践行者。在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语境下,“法律”既可以直接来自神明,也可以由凡俗世界的政治家制定;它可以是祖先留下来的、约定俗成的文化习惯,也可以是应现实需要而临时提出的刚性规定。^②事实上,在现存第一部提及“法律”的希腊语传世文献——《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告诉我们,最早向凡人颁布法律的正是天神宙斯。^③奥斯特瓦尔德在其经典著作《法律与雅典民主制的起源》中总结了现存古希腊语文本中“法律”(νόμος)一词的13种不同义项,并明确提出该字眼从相当古老的时代起便包含了宗教规范的含义。^④因此,毫无疑问的是,将虔诚视为至高美德的居鲁士在色诺芬眼中必定是一位恪守神圣法度的优秀国王。

首先,《居鲁士的教育》留下了关于居鲁士敬奉神明法度的大量记载,以至于该书的一位早期译者阿什利甚至将之视为一部讨论宗教教育的作品。^⑤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居鲁士在进行重要活动前一定不会忘记向神明占卜和奉献祭祀。^⑥攻克巴比伦后,居鲁士立刻召见玛哥僧们(magi),请他们为神明选定圣所,用战利品中的一部分首先向诸神献祭。^⑦居鲁士大帝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向新征服的臣民表明,自己充分尊重诸神的意志和玛哥僧的指令。他“永远不会忘记在破晓时向天神吟唱颂歌,以及每天向玛哥僧供奉的神明奉献祭品”^⑧。色诺芬在这些段落中主要意在表彰居鲁士大

①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106。

② 参见 H. Liddell and R.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the ninth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1996, p. 1180。

③ 参见 Hes. *Op.* 276—280。

④ 参见 M. Ostwald, *Nomos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Athenian Democracy*, Clarendon Press, 1969, pp. 20—54。

⑤ 参见 Tatum, *Xenophon's Imperial Fic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p. 31。

⑥ 参见 Xen. *Cyr.* 1.5.6, 6.2.40。

⑦ 参见 Xen. *Cyr.* 7.5.35。

⑧ Xen. *Cyr.* 8.1.23。

帝的虔诚,如此虔诚的国王必然是会尊重神明的法度与玛哥僧的指令的。

其次,居鲁士大帝也并不轻视世俗法律的重要性。居鲁士个人权力的最初来源——父亲冈比西斯的权力便是严格受到法律限制的。尽管他的父亲已成为“米底全境的主宰”,他仍旧尊重全体波斯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①居鲁士的父亲永远率先接受法律的决议,执行法律的指令。他判断是非的依据不是个人意志,而是既定的法律。^②事实上,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大帝不仅尊重世俗法律,还会努力按照法律的要求提高自己的美德。在他的心目中,优秀的统治者应当成为“长眼睛的法律”。^③在弥留之际,居鲁士告诫自己的孩子们说:“要听从我的话,因为它是合乎传统、习俗与法度的。”^④这条证据清晰地表明,居鲁士推行的德化教育并不触犯现行法律。相反,二者始终是一致的,有时甚至可以彼此等同。我们有理由认为,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中居鲁士大帝的若干教导所反映的正是波斯历史上某个时期宗教法规与传统习俗所提出的具体要求。^⑤

与《居鲁士的教育》有所不同的是,《拉栖第梦政制》的主题正

① Xen. Cyr. 1.3.18.

② 参见 Xen. Cyr. 1.3.18.

③ Xen. Cyr. 8.1.21—22.

④ Xen. Cyr. 8.7.10.

⑤ 在古典学研究史上一度存在着一种全盘否定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史料价值的倾向。(参见 S. Hirsch, *The Friendship of the Barbarians, Xenophon and the Persian Empire*, Hanover & London: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5, pp. 61—62) 然而,正如赫希指出的那样,很难想象色诺芬会完全凭空虚构出如此丰富的波斯史细节,并且其中一些信息是同外部证据高度吻合的(p. 63)。笔者认为,尽管《居鲁士的教育》一书确实包含着不少违背史实的细节描述(参见王以欣:《居鲁士的早年传奇与口传历史》,《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第4—5、9页;陈钊:《〈居鲁士的教育〉体裁考析》,《文教资料》,2013年第15期,第14—16页),但色诺芬对波斯政治制度与开国历史的整体叙述框架与同时代希腊人对波斯帝国的认识水平是基本一致的,在许多具体方面无疑还要更胜一筹。色诺芬必然能够通过自己的生平阅历和史学研究了解波斯政治意识形态对神圣与世俗法律的高度尊重,设想色诺芬会将自己笔下的理想英雄居鲁士大帝描述成不受法律节制的僭主形象的思路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是立法活动对斯巴达公民的积极影响。然而，读者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形象酷似居鲁士大帝的莱库古始终在幕后操纵着法律体系的运转。色诺芬在篇首处开门见山地指出了莱库古的成就与贡献。

从前，每当我想到，尽管斯巴达本身的人口相当稀少，她却可以作为一个最为强大、最负盛名的城邦屹立于希腊世界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惊异，想知道这一切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但当我理解了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ἐπιτήδεσμα*）之后，我便不复感到惊讶了。我钦佩莱库古，因为他赐予斯巴达人法律，引领他们走向繁荣昌盛（*εὐδαιμονία*）；并认为此人具有极高的智慧。因为他并不机械地效法其他城邦，而是采用了与大多数城邦截然不同的制度，从而为他的母邦指出了通向强盛的道路。^①

可见，莱库古在斯巴达所扮演的角色同缔造波斯帝国的居鲁士极其相似。他正是整部作品其余部分详细介绍的贤明法律、制度的制定者与设计师。与居鲁士大帝相似，莱库古也十分注意同身边的官吏精诚合作。居鲁士的士兵们无条件地服从长官的指令；斯巴达的监察官们也会代表国家与莱库古交换誓言。^② 莱库古和斯巴达的其他贤明国王同样具备某些超自然的特性，会在葬礼上被奉为介于人神之间的伟大英雄。^③

要之，《居鲁士的教育》和《拉栖第梦政制》所勾勒的政治体系蓝图在本质上是高度相似的。在前者中，理想君王居鲁士大帝在贤明法度的指引下承担着全社会道德教化的艰巨使命；而在后者中，莱库古通过身体力行的立法活动规范着斯巴达公民的行为，维持着社会的政治稳定与道德水准。然而，两套体系都在创建者去世后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与瓦解。

（八）差异性

塔普林在《色诺芬、斯巴达与〈居鲁士的教育〉》一文中，比较了色诺芬大部分现存作品中斯巴达与波斯的形象，指出二者在

① Xen. Lac. 1.1-2.

② 参见 Xen. Lac. 15.7-8。

③ 参见 Xen. Lac. 15.9。

《回忆苏格拉底》《会饮篇》(*Symposium*)与《阿格西劳斯》等色诺芬作品中的相似性很低,并且对两个政权进行直接比较的例子十分稀少。^①然而,我们前面的一系列分析似乎表明,《居鲁士的教育》与《拉栖第梦政制》两部著作的内容确实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但二者间也确实存在着一定差异,其中十分显著的一点便是对待赏罚的态度。

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奖赏朋友构成了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手段。居鲁士大帝相信,“好牧人和好国王的职责是非常近似的”^②。既然好牧人有时需要取悦于他的畜群,那么,好国王有时也需要如此对待他治下的民众。基于这一考虑,居鲁士大帝“在热心款待朋友方面无出其右”^③。更重要的是,居鲁士大帝不是在滥施赏赐,而是怀有明确的道德教育目的。色诺芬解释道,居鲁士相信:“如果行为正直的人总能得到相应的犒赏,那么其他人就更有可能会打消追逐不义之财的念头,转而通过光明正大的手段为自己争取一个好前程。”^④赏赐也是劝善抑恶^⑤和争取民心^⑥的最佳手段。居鲁士慷慨赏赐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尽力在居鲁士的眼中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⑦。

在《拉栖第梦政制》中,同样的效果则是通过截然相反的手段——严厉的惩罚措施实现的。例如,怯懦者会在几乎所有公共场合下受到轻视甚至羞辱。没有人会愿意在摔跤训练中与他同组;他会在合唱队中被置于最不起眼的角落;他在大街上必须为其他公民让路;他在宴会上必须给比自己年幼的人让座。如果这个懦夫拒绝做到这一切的话,“更优秀的人便有资格对他进行体罚”^⑧。根据

① 参见 Tuplin, “Xenophon, Sparta and the *Cyropaedia*,” pp. 128, 132–133。

② Xen. *Cyr.* 8. 2. 14.

③ Xen. *Cyr.* 8. 2. 14.

④ Xen. *Cyr.* 8. 1. 26.

⑤ 参见 Xen. *Cyr.* 8. 1. 27.

⑥ 参见 Xen. *Cyr.* 8. 1. 29.

⑦ Xen. *Cyr.* 8. 1. 39.

⑧ Xen. *Lac.* 9. 4–5.

色诺芬的报道，莱库古的严厉惩罚不仅针对公民的过失，他还会处罚那些没能做到最好的怠惰者。^①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种相反相成的对比关系。一方面，居鲁士大帝的赏赐是相当奢侈的。他会用“财物、权位和荣誉等种种好处”去犒赏自己的追随者^②，以至于他的出手阔绰较他的富有更加令人印象深刻^③。然而，在《拉栖第梦政制》所描绘的世界里，诸如此类的滥赏与挥霍是不可容忍的。莱库古甚至禁止公民经商，要求他们时刻保持生活简朴。^④另一方面，作为教育手段的惩罚在《居鲁士的教育》中仅仅出现了两次^⑤，并且其作用远不如在斯巴达体制下那样重要。

另一个显著区别在于，两部著作对“教育”（*παιδεία*）的理解似乎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拉栖第梦政制》中，教育的范畴更加符合希腊古典时期的传统语境，主要针对儿童和青年；而在《居鲁士的教育》里，正如本文即将详细介绍的那样，教育是终身性的，对每个人施加着从生到死的巨大影响。

塔普林在其论文中还罗列了居鲁士统治的波斯与莱库古治理的斯巴达在其他方面的若干差异，如居鲁士的帝国模式缺乏斯巴达的特异性等。^⑥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的差异性其实是很好理解的。毕竟，色诺芬并不像纳顿针对《居鲁士的教育》所提出的假说（他将整部作品称为“一套政治理论”）那样，完全凭空捏造了波斯与斯巴达两个政权的各种构成要素^⑦；并且他也没有必要在介绍波斯帝国的幌子下对斯巴达进行赞美^⑧。现实中斯巴达与波斯的政

① 参见 Xen. *Lac.* 10.5。

② Xen. *Cyr.* 8.1.39。

③ 参见 Xen. *Cyr.* 8.2.7。

④ 参见 Xen. *Lac.* 7.1-2。

⑤ 参见 Xen. *Cyr.* 8.1.17-18。

⑥ 参见 Tuplin, “Xenophon, Sparta and the *Cyropaedia*,” pp. 138-139。

⑦ 参见 C. Nadon, *Xenophon's Prince: Republic and Empire in the Cyropae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1。

⑧ 参见 Tuplin, “Xenophon, Sparta and the *Cyropaedia*,” p. 135。

治、教育制度当然存在着诸多差异,并且色诺芬的古典读者们必然也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尽管色诺芬确实利用时空相隔遥远的便利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创作自由,但他不可能完全抛开历史事实而进行随心所欲的虚构。^①而他在两部作品中对“教育”概念的不同阐释或许反映了不同创作年代中色诺芬本人的思想演变轨迹或两部作品预设读者群体的不同,其具体情况是现代读者们无从得知的。总的来说,《居鲁士的教育》与《拉栖第梦政制》在内容上的相似性是主导性的和引人注目的;而二者的差异性则是次要的和易于解释的。这些共同特征并不仅仅是历史上波斯与斯巴达相似发展轨迹的产物^②,而是与两篇文献的共同作者色诺芬观念中理想教育体系与成功政治体制之间的密切联系高度相关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居鲁士的教育》在题材上往往较《拉栖第梦政制》更为宽泛,其中穿插着潘特娅(Pantheia)的爱情悲剧故事^③、狩猎^④、军事技术的传授^⑤与会饮场合的礼仪规范^⑥。概言之,它囊括了一切公共场合进行的集体活动。可见,《居鲁士的教育》是一部涵盖了《拉栖第梦政制》中色诺芬所关注的几乎全部要点,但其题材又不仅限于“政体论著”范畴的庞杂作品。

三、色诺芬的社会教化观念

诚然,对于同一作者撰写的两部作品而言,逻辑思路、核心观点、写作素材与文字风格等方面的局部雷同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我们之前的分析似乎表明,当讨论“教育”主题的《居鲁士的教育》同

①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22。

② 参见 Tuplin, “Xenophon, Sparta and the *Cyropaedia*,” pp. 137—138。古希腊史料中将莱库古与居鲁士进行对比的另一个例子是 Pl. *Epist.* 4. 320d, 但该文本被大多数校勘者疑为伪作。

③ 参见 Xen. *Cyr.* 4. 6. 11—7. 3. 16。

④ 参见 Xen. *Cyr.* 1. 4. 8。

⑤ 参见 Xen. *Cyr.* 8. 8. 24。

⑥ 参见 Xen. *Cyr.* 4. 5. 4—8。

分析“政体”的《拉栖第梦政制》之间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时，这一发现确实是耐人寻味，甚至是令人惊异的。自罗马时代以降，许多学者都试图将《居鲁士的教育》解释成一部讨论政体优劣的作品。除本文开篇处引述的西塞罗信函外，第欧根尼·拉尔修将柏拉图和色诺芬视为同一主题方面的竞争者^①，并将《居鲁士的教育》与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相提并论。盖利乌斯也认为，《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代表了色诺芬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批判意见。^②尽管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若干细节描述很可能出自后人的附会，但古代评论家所指出的《居鲁士的教育》政治学色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史实的。在现代研究者中，迪尤相信，在《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色诺芬的主题是统治艺术或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问题”^③。笔者认为，迪尤的看法已十分接近于事实本身。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确实如作品标题所述，是一部以教育为主题的著作；但色诺芬语境下的教育兼具浓厚的道德与政治色彩。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居鲁士的教育》希腊文标题(*Κύρου Παιδεία*)的合法性与通行程度，它出现在了所有现存早期手稿与第欧根尼·拉尔修为色诺芬撰写的传记中。^④然而，布赖滕巴赫(Breitenbach)认为，只有全书的第1卷才符合这一主题。^⑤格拉甚至相信，除1.6.1—2.1.1这部分段落之外，全书的任何章节都与居鲁士的教育毫无干系。^⑥然而，希金斯于1973年正确地指出：

居鲁士的一生诠释了一种实践的理想。一些批评者认为，“居鲁士的教育”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标题，因为只有第1卷才与居鲁士的教育相关；这种意见是对色诺芬思想的误读。在色诺芬看来，真正的教育(*paideia*)是一个循序渐进、永无

① 参见 Diog. Laert. 3.34。

② 参见 Gell. NA. 14.3.1—4。

③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207.

④ 参见 Diog. Laert. 2.56。

⑤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15。

⑥ 参见 Gera, *Xenophon's Cyropaedia, Style, Genre, and Literary Technique*, p. 50。

止境的过程,受教育者随着身体与心智的成熟而在不同的年龄掌握不同的技能、完成不同的任务。它显然不仅限于教导青少年,因为色诺芬根本就不认为学习的过程是有止境的。^①

迪尤还指出,色诺芬所理解的“教育”是广义上的,并不仅限于文化知识与实用技能的学习。^②笔者认为,色诺芬语境下的“教育”确实是广义的,但其涵盖范围可能比希金斯和迪尤所设想的还要广泛。

首先,色诺芬笔下的教育是终身性的。在《居鲁士的教育》第1卷中,色诺芬向读者系统介绍了波斯的教育模式。在色诺芬语境下的波斯帝国中,教育并不是贵族享受的特权或富人进行的投资,而是法律强制规定的义务。^③这种教育有其专用场地——“开放广场”(ἐλεύθερα ἀγορά)^④。根据色诺芬的记载:“(公共建筑物四周的)广场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属于儿童;一部分属于青年;第三部分属于成年人;最后一部分则属于已过服役年龄的老人。”^⑤法律规定,所有本地居民每天都要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广场去接受教育。广场上的每个区分别由从12个波斯部落中选出的12名官员负责管理。儿童们需要学习公正与自律等美德。他们在16—17岁时进入青年区。青年们的任务是守卫城市和进一步培养自律能力。^⑥如果儿童或青年在竞赛中获奖,管理他们的官员也会得到表彰。10年之后,受教育者进入成年组并参军服役。当他们达到50岁左右后,这些人便可以成为元老,负责各种公私案件的审判工作。^⑦

我们看到,这种类型的教育显然是有别于现代的教育概念和

① W. Higgins, *Xenophon the Athenian, the Problem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 of the Poli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3, p. 54.

②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15.

③ 参见 Xen. Cyr. 1. 2. 2—3.

④ Xen. Cyr. 1. 2. 3.

⑤ Xen. Cyr. 1. 2. 4.

⑥ 参见 Xen. Cyr. 1. 2. 4—9.

⑦ 参见 Xen. Cyr. 1. 2. 12—14.

雅典古典时期的哲学教育的。^① 它伴随受教育者的一生^②，并且主要是在课堂与学校之外进行的。它是一种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涉及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居鲁士的教育》何以是一部讨论教育的著作了。色诺芬所探讨的不是狭义上的教育概念，而是在上述波斯教育模式基础上改造而成的社会化教育。

其次，色诺芬语境下的社会教育必须由一位理想的政治领袖付诸实践。这正是他选取居鲁士大帝为主人公的理由，因为居鲁士在治理民众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③ 然而，色诺芬并未事无巨细地描述居鲁士一生中的各种经历，也没有覆盖居鲁士传奇生涯中的全部光辉业绩；他的素材择取方式是按照古代道德化传记作者们的习惯，择取居鲁士生平中被后世作家普鲁塔克称为“迹象”（σημείον）的典型事例。^④ 在这层意义上，《居鲁士的教育》所记载的各种内容都是合乎作者设定的主题的。^⑤ 按照色诺芬的思路，既然他所理解的教育是公共的和社会性的，那么，只有居鲁士大帝与莱库古等人格完满、禀赋过人的政治领袖才具备足够的责任感、能力与权威去将这种社会教化付诸实践。这种教育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适用于政治生活的；而优秀政体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便是推行色诺芬的社会教育理想。这正是我们在《居鲁士的教育》与《拉栖第梦政制》中发现大量共同点的原因。

最后，作为苏格拉底的崇拜者与弟子，色诺芬语境下社会教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笔者认为，这一点是迪尤等研究者们有所忽略的重要方面。色诺芬的终极目标并不是为某位君王歌功颂德，或为政治家与军事将领撰写技术指导手册。他

① 参见 J. Reiser, "Ambition and Corruption in Xenophon's *Education of Cyrus*," *The Journal of Ancient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Vol. 26, No. 2, 2009, pp. 296–315.

② 参见 Higgins, *Xenophon the Athenian, the Problem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 of the Polis*, p. 46;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15.

③ 参见 Xen. Cyr. 1.1.6.

④ 参见 Tatum, *Xenophon's Imperial Fic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p. 102.

⑤ 参见 Tatum, *Xenophon's Imperial Fic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p. 146.

的雄心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化教育树立一套臻于完美的、苏格拉底式的道德规范。^①因此,《居鲁士的教育》绝非为政治家量身定做的实用手册。在这部作品中,色诺芬并不关心如何课税理财、发展对外贸易、选拔与考核官吏、饲养战马和生产武器。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与政治家,色诺芬当然知道处理这些事务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统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些工作与他的社会化教育关系不大,因而并未成为《居鲁士的教育》一书所关注的主题。另外,政治范畴之外的某些事务却是同社会教育密切相关的,如爱情与友谊的本质、社交活动中的得体规范、敬奉神明的神圣仪式,等等。这些事务对于培养民众的道德情操至关重要。因此,《居鲁士的教育》的主题基本涵盖了《拉栖第梦政制》的核心要点,但其关注范围又不仅限于此。色诺芬心目中社会教育的范畴与政治领域存在着巨大的交集,同时又包含了政治之外的许多内容。

当然,这一雄心勃勃的理想并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的。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导言中写道:

我们会想到,无数民主政权曾被民众所推翻,他们宁愿生活在任何一种其他政体之下,也不愿继续在民主制中苟活;与此同时,历史上的无数君主制与寡头政权都被民众废除了。我们还会想到,无数个人在掌握绝对权力后迅速遭到罢黜;或者他们在短期掌权之后,世人便会惊异于他们如何一度被视为睿智、幸福之人。无独有偶,我们还曾看到,即便在私人家庭中,拥有大量或少数几名奴仆的人都无法在仆人面前树立自己的权威,尽管他们本是名义上的主人。

此外,我们还会想到,放牛郎是牛群的主人,马夫是马匹的主人,所有的牧人都是他们负责的畜群当之无愧的主人。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动物都比人类能够更好地服从自己的统治者。因为畜群总会跟随牧人带领的方向,在指定的地点吃草,远离主人禁止它们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欣然准许主人通过自己获得利益。而我们从未听说哪只牲畜密谋反

^① 参见 R. Seager, "Xenophon and Athenian Democratic Ideology,"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51, No. 2, 2001, p. 391。

对牧人，拒绝服从他的指令或阻挠他获取放牧的收益。不过，当生人试图驾驭它们或从它们身上获得好处时，畜群可就不像在主人面前那么听话了。相反，人类最激烈地反对的恰恰是试图统治他们的人。因此，在进行了这样的比较后，我们会认为，管理任何生物都要比管理人类来得容易。^①

笔者认为，这两段文字明确指出了色诺芬撰写《居鲁士的教育》的基本目的。它所关注的既是道德教育，又是领导艺术。^②古代作家将之同柏拉图的《理想国》进行比较确有一定道理，因为二者所探讨的主题确实存在着一定相似性。牧人的比喻同样也出现在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尽管后者讨论的是统治的正义性，而非管理人类的难度。^③在色诺芬眼中，统治人类的难度远过于驯服其他动物。这并非因为人类拥有比动物更大的气力，而是因为他们拥有自由意志，勇于反抗强加给他们的任何权威。因此，解决社会治理的终极手段只能是德化与哲学教育。居鲁士大帝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使命。色诺芬描述道：“通过树立道德榜样，居鲁士为自己的臣子们树立了得体的宫廷行为准则。他们恭敬地对待比自己高贵的人物，彼此之间也能做到互相尊重礼让。你永远不会听到他们高声怒吼或放声大笑；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确实在追求高贵的生活方式。”^④在波斯臣民眼中，居鲁士大帝不只是他们的君王，而且还是他们的慈父；他是人民的造福者，而非独断专行的暴君。^⑤我们看到，在全书结尾处，导言中弥漫的悲观情绪被费劳拉斯（Pheraulas）的乐观评价一扫而光。在他看来，人类乃是“所有生灵中最为优秀、最懂得知恩图报的。当人们受到他人赞美时，他们便乐于用赞美作为回报；当有人赐予他们恩惠时，他们会尽力报答自己的恩人；当他们意识到别人在善待自己时，他们也会对对方以

① Xen. Cyr. 1.1.1-3.

② 参见 Sandridge, *Loving Humanity, Learning, and Being Honored: The Foundations of Leadership in Xenophon's Education of Cyrus*, p. 119.

③ 参见 Pl. *Resp.* 343b-345c.

④ Xen. Cyr. 8.1.33.

⑤ 参见 Xen. Cyr. 8.2.9.

礼相待；当他们知道有人喜爱自己时，他们也不会反感这样的人。人类还比其他生物更真诚地在父母生前死后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可见，其他生物都不如人类懂得感恩和有情有义”^①。要之，每个臣民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并不是坏事，因为人类的天性是善良的和知恩图报的。重要的是统治者应懂得如何引导他们的心智进入向善、节制与虔诚的状态。这正是色诺芬虚构的居鲁士大帝的首要成就，同时也是哲学家色诺芬的社会改造理想。

四、色诺芬笔下居鲁士大帝的历史原型

在古典文学史上，理想化君主的形象并不罕见。伊索克拉底的《埃瓦格拉斯》(Evagoras)中的贤明帝王埃瓦格拉斯、索福克勒斯的《奥狄浦斯在科洛诺斯》(Oedipus Coloneus)中的提修斯，以及品达(Pindar)与巴库利德斯(Bacchylides)颂歌中的希耶罗都是高度理想化的、遵守法度的帝王形象。然而，纵观整部希腊古典时代的政治思想史，似乎只有苏格拉底的两位门徒——柏拉图和色诺芬——提出了理想的政治领袖可以凭一己之力挑起全社会道德教育重担的思想。我们看到，作为完美政治领袖的、理想化的居鲁士大帝在色诺芬的社会教育体系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他建立了并维系着整套教育体系；这套体系在他去世后随即走向瓦解。那么，这个独特虚构人物是否拥有自己的历史原型呢？色诺芬关于居鲁士大帝的素材究竟是来自于波斯帝国的历史档案与口头传说，还是简单剽窃了自己的“对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塑造的哲人王形象呢？

古典学界关于《居鲁士的教育》创作年代的研究或许可以为我們提供一些相关线索。与色诺芬的大部分其他著作不同的是，《居鲁士的教育》的成书年代是可以大致确定的。绝大多数相关研究者认为，《居鲁士的教育》定稿于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60年之间^②，也就是创作于柏拉图《理想国》成书20余年之后；并且古代

^① Xen. Cyr. 8.3.49.

^② 参见 Gera, *Xenophon's Cyropaedia, Style, Genre, and Literary Technique*, p. 23; J. K. Anderson, *Xenophon*, Duckworth, 1974, p. 2.

作家们确实普遍认为两部作品的论点存在着承袭关系^①。因此，色诺芬有可能确实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汲取了若干灵感。然而，笔者认为，《居鲁士的教育》中居鲁士大帝的鲜活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于色诺芬本人的生活阅历，代表着作者对当代史与个人政治军事生涯成败得失的总结。

在其年代最早的现存作品^②《长征记》(*Anabasis*)中，色诺芬向我们介绍了亲自领导过自己的波斯王公小居鲁士的形象；正如格拉指出的那样，小居鲁士无疑构成了色诺芬笔下自身先祖的第一个原型。^③色诺芬认为，小居鲁士是“自居鲁士大帝时代以来最具帝王气质、最适合统治全体波斯人的统治者”^④。自孩提时代以来，他便在许多方面鹤立鸡群。^⑤小居鲁士的侠义作风使得所有朋友对他忠心不二。^⑥他赏赐朋友时的挥金如土与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大帝如出一辙。^⑦

居鲁士的另一个原型是色诺芬《希腊史》(*Hellenica*)所提及的帖撒利僭主伊阿宋(Jason of Pherae)。^⑧作为《希腊史》第4—6卷重点介绍的一位枭雄，伊阿宋的功业与政治手腕必然是色诺芬耳熟能详的。^⑨这位僭主生前享受着巨大权力和崇高声望。^⑩他身体健壮，勤于政事。^⑪他同样慷慨地赏赐自己的朋友，并成功地吸引仇敌自愿转变为自己的盟友。^⑫他自比为波斯国王与阿格西劳斯，

① 参见 Gell. *NA*. 14. 3. 1—4。

②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205。

③ 参见 Gera, *Xenophon's Cyropaedia, Style, Genre, and Literary Technique*, p. 11。

④ Xen. *An.* 1. 9. 1.

⑤ 参见 Xen. *An.* 1. 9. 2。

⑥ 参见 Xen. *An.* 1. 9. 20。

⑦ 参见 Xen. *An.* 1. 9. 23。

⑧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186。

⑨ 参见 Xen. *Hell.* 6. 1. 4—9, 6. 4. 20—37。

⑩ 参见 Xen. *Hell.* 6. 1. 4。

⑪ 参见 Xen. *Hell.* 6. 1. 5—6。

⑫ 参见 Xen. *Hell.* 6. 1. 6—7。

并认为自己更胜一筹。^①由于盟友众多的缘故,伊阿宋成了色诺芬生活时代声名最为显赫、不容任何人小觑的风云人物。^②正如居鲁士大帝尊重波斯神祇与玛哥僧一样,伊阿宋也对天神阿波罗极其虔诚。^③

居鲁士大帝的第三个原型来自《长征记》中的色诺芬本人。当希腊雇佣兵的领袖们被捕,士气低落的希腊将士们被困于波斯帝国中心的危难关头^④,色诺芬接受了神圣的梦兆^⑤,决定率领同胞们突出重围。通过整饬军纪、敬奉神明^⑥、树立威信与鼓舞军心^⑦等手段,色诺芬和其他希腊将领共同带领这支内部矛盾重重的雇佣军逃离了险境,完成了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罕见壮举。他所采用的手段同样是与居鲁士大帝十分近似的。

居鲁士的最后一位原型是色诺芬的老师苏格拉底。格拉对此已进行过扎实且深入的研究。她指出,苏格拉底的身影在《居鲁士的教育》中是无处不在的。他和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大帝具有许多相似的人格特征;《居鲁士的教育》所记载的若干事件可能同苏格拉底的审判和临终谈话有关;居鲁士与克吕珊塔斯之间的交谈与《回忆苏格拉底》中的对话甚至存在着文字上的雷同之处。^⑧

要之,《居鲁士的教育》中的居鲁士形象主要来自于色诺芬现实生活中的经历与见闻。与此同时,它也可能部分来自于苏格拉底哲学流派传统,如柏拉图《理想国》关于哲人王的论述。《居鲁士的教育》是色诺芬老年时期对自身教育思想与人生阅历的一次总结。作为一名生于雅典、奔走漂泊于波斯、斯巴达、伊利斯、科林斯

① 参见 Xen. *Hell.* 6.1.12。

② 参见 Xen. *Hell.* 6.4.28。

③ 参见 Xen. *Hell.* 6.4.29-30。

④ 参见 Xen. *An.* 3.1.2。

⑤ 参见 Xen. *An.* 3.1.11-12。

⑥ 参见 Xen. *An.* 3.1.38-44。

⑦ 参见 Xen. *An.* 3.2.20-31。

⑧ 参见 Gera, *Xenophon's Cyropaedia, Style, Genre, and Literary Technique*, pp. 26, 27, 115。

等地^①的“世界公民”^②，色诺芬将自己一生的经验和对理想政治制度与社会教育体系的严肃思考成果写进了自己篇幅最长、分量最重的巨著——《居鲁士的教育》之中。

五、结 语

《居鲁士的教育》在形式上颇为近似一部讨论政体问题的著作，但它的真正主题是社会教育。这种教育适用于各个年龄段的民众，涉及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推行社会教化的中流砥柱是一位理想化的政治领袖，在《居鲁士的教育》中具体化身为历史人物居鲁士大帝，其完美形象的构成要素主要来自于色诺芬本人的阅历与见闻。这种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从苏格拉底伦理哲学的意义上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因此，尽管《居鲁士的教育》对希腊化时代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③，它本身并不是色诺芬著作集中的次要作品^④，或一部用于消遣娱乐的波斯传奇故事集。它的主题是宏大和严肃的，构成了色诺芬在晚年对自己人生阅历与思想成果的一次系统总结。

与柏拉图笔下略显抽象的哲人王不同，色诺芬所虚构的居鲁士大帝自始至终是一位实干家。^⑤他在童年时代偶尔会犯下幼稚错误，但很快便通过勤奋好学与身体力行而具备了种种美德。他征服并教化了波斯帝国境内形形色色的居民；他甚至具备洞察神意的超自然能力；并且他还会在必要的场合下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⑥他的成功是以军事征服与政治集权为基础的。与此同时，这位生杀予夺的政治领袖首先是一位有血有肉、德行高洁之人。^⑦他推行社

① 参见 Delebecque, *Essai sur la vie de Xénophon*, p. 56。

② J. Ferguson, *Utopias of the Classical World*, Thames & Hudson, 1975, p. 56。

③ 参见 Reichel, “Xenophon’s *Cyropaedia* and the Hellenistic Novel,” p. 438。

④ 参见 Tatum, *Xenophon’s Imperial Fic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p. 40。

⑤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184。

⑥ 参见 Xen. *Cyr.* 7. 5. 37—40, 8. 1. 17—20, 8. 2. 10—12。

⑦ 参见 Due, *The Cyropaedia, Xenophon’s Aims and Methods*, p. 19。

会教化的终极目的是道德性的和哲学性的。^①一切政治、经济与家庭事务的管理者都可以通过学习他的榜样而获益。^②他提供了色诺芬《家政论》(*Oeconomicus*)中伊斯科玛库斯(Ischomachus)渴求的一整套统治艺术;他完成了小居鲁士、阿格西劳斯与伊帕密浓达等豪杰在现实生活中未能彻底完成的历史使命^③;他的个人魅力足以感化推翻贤君统治、处死苏格拉底的冥顽暴民。一言以蔽之,居鲁士大帝式的超人“非但不会被现实压倒,还能够让整个世界改头换面”^④。

然而,与柏拉图和其他学者提出的乌托邦式理想不同的是,色诺芬从未梦想过他所赞美的波斯教育制度与斯巴达政体可以万古长存。他从未试图回答在其生活年代之前与之后的专制制度始终未能解决的普遍性难题:当一代雄主与世长辞、暗弱之君取而代之后,当一套优秀的政治体制在成功与荣耀中走向腐败与保守之际,伟大的帝国与完美的体制终将走向分崩离析。当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大帝与莱库古撒手人寰之后,他们苦心经营的完美社会教化体系也会成为过眼云烟。纳顿认为,色诺芬事实上洞察到了所有古代政治生活方式的共同弱点与同时代一切现存政体的局限性。^⑤认为一位生活在两千余年前的古人业已具备如此深刻思想的假说或许不无拔高之嫌。然而,无论如何,作为一位实践经验丰富的将领与政治家,色诺芬关于统治艺术的思想确实具备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演说家的个人特色,值得受到当代古希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 刘训练)

① 参见 M. Tamiolaki, "Virtue and Leadership in Xenophon: Ideal Leaders or Ideal Losers?" in *Xenophon: Ethical Principles and Historical Enquiry*, F. Hobden and C. Tuplin eds., Brill, 2012, p. 563.

② 参见 Carlier, "The Idea of Imperial Monarchy in Xenophon's *Cyropaedia*," p. 330.

③ 参见 Tatum, *Xenophon's Imperial Fic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p. 58.

④ Tatum, *Xenophon's Imperial Fic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 p. 58.

⑤ 参见 Nadon, *Xenophon's Prince: Republic and Empire in the Cyropaedia*, pp. 164, 178.

ABSTRACTS

“Tianxia” and “State”

——The Two Directions of Shaping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Yang Zhaozhong

Abstract: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feudal system” of governance to the “county system”, on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is the emphasis on “Tianxia” rather than “State”. The political idea of “Tianxia” is its core,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universal” civilization is the main concern of it. In modern time, both the idea and the i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the politics of “Tianxia” have been disintegrated to a large extent. The idea of “Nation-State”,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became more significant. However,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threat to the sense of hu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securi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For the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approach of Confucian politics, the ideas of “Tianxia” and “State” should be remolded. The weakness of its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tate” can be complemented and enriched by modern “State consciousness”, while the concept of “Tianxia” can help relieve the plight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s political order.

Key words: Tianxia; State;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ical dimension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Xenophon’s *Cyropaedia*

Lv Houlia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Xenophon’s *Cyropaedia* is a unique work, and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its nature. *Cyropaedia* shares many common features with 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taken as a narrative of the social education of morality carried out by ideal political leadership. The image of the ideal leader in charge of the r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Cyrus the Great, is mainly based on historical figures in Xenophon’s

age. It conveys Xenophon's own utopian design of an ideal constitu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Greek world.

Key words: *Cyropaedia*; Xenophon; social education of morality

Griffin and Dante's Vision of Monarchy

Zhu Zhenyu

Abstract: In Eden, at the summit of Dante's purgatory, a mystical procession with Apocalyptic reminiscence reveals the world history to Dante. The most remarkable vision in the procession is a griffin and the chariot it draws. Traditional commentary takes Griffin as the sign of Christ, and the chariot as the church. Peter Amour, with his erudite textual research, succeeds in giving a new interpretation. For him, then, Griffin represents the monarch who rules the world by divine justice, and the chariot represents the monarchy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him. In Dante's days, the old worldwide empire, Rome, has passed away, but Dante the poet, with his apocalyptic writing, calls DXV, the new monarch of the new spiritual monarchy.

Key words: Griffin; Dante; monarchy

The Spirit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Montesquieu

Zhang Hongxin

Abstract: The issue of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s controversial in leg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is results in debates over its significance, scope and ground. The problem of power cannot be disentangled from the problem of constitution-making.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based on function does not fit Montesquieu's theory, and it is the three different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men, i. e. the making of laws, the execution of decisions and the adjudication, that are formed in Montesquieu's original expression. Powers must not only be separated, but also be combined for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political freedom. A liberal constitution is necessarily a mixed constitution.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Montesquieu's analysis is not so much a conclusion as an invitation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Montesquieu; separation of powers; political freedom; mixed constitution